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 卷 四 |

钱 穆 · 著



钱穆·著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从

——
卷肆
——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4/钱穆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 6

ISBN 7-5336-3772-0

I. 中... II. 钱... III. 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文集 IV. B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1680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责任编辑: 唐元明

装帧设计: 袁 泉

技术编辑: 吴丽君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 (合肥市回龙桥路 1 号)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200 000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 000

定 价: 20.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 (0551) 2651321

邮 编: 230061



序

本册乃《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编之下，为第四册。专关隋唐五代部分。共收文十六篇。前四篇王通文中子及论韩柳古文运动，余皆论唐代之禅宗，乃占全册篇幅四之三。犹忆民国三十二年春，卧病成都华西坝，累月不能下楼。一日，闲卧楼廊，忽思读书消遣，乃取《朱子语类》有关讨论宋代者七卷，逐条阅之。初谓一时觉倦，即可闭目小憩，无伤精力。不意七卷完，精力愈来，遂顺序读至终编。又逆而上溯，约可两月余而全书竟，病亦良瘥。是夏，避暑灌县灵岩山，借得山僧《指月录》，循诵毕而返。是冬又病，偶忆胡适之《神会和尚集》，借来枕上翻阅。翌春，写《神会与〈坛经〉》及《禅宗与理学》两篇。是为余撰述唐代禅宗问题之第一期。此后即放弃不理。一九六三年在九龙沙田和凤台，又闲翻佛书，续成《读〈六祖坛经〉》等数篇，是为余撰述唐代禅宗问题之第二期。惟此期所成迄未发表。一九七〇年之冬，又在台北善导寺偶讲《六祖坛经》大义，信胡氏之说者纷起讨论，余所答辩，此皆不存。后又续成《读宗密〈原人论〉》及《评胡适铃木大拙讨论禅》诸篇，是为余撰述唐代禅宗问题之第三期。兹所荟萃，前后亦越三十有余年矣。所知犹昔，而岁月已逝。回念前尘，岂胜惋怅。

一九七七年端午节后两日钱穆自识于
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八十有三

目 录

序·····	1
读王通《中说》·····	1
杂论唐代古文运动 ·····	16
读《柳宗元集》 ·····	68
读姚铉《唐文粹》 ·····	78
神会与《坛经》 ·····	85
读《六祖坛经》·····	120
《六祖坛经》大义·····	131
记《坛经》与《大涅槃经》之定慧等学·····	140
读《少室逸书》·····	144
读宝志《十四科颂》·····	154
读寒山诗·····	157
读宗密《原人论》·····	175
评胡适与铃木大拙讨论禅·····	190
禅宗与理学·····	200
再论禅宗与理学·····	214
三论禅宗与理学·····	230

读王通《中说》

文中子王通，乃隋代大儒，后人以与董仲舒、扬雄、韩愈并尊。然其人《隋书》无传，其所为《中说》，又多伪纂。其人其书，遂多疑辨，若沦为可有可无之列。惟余读其书，确有反映出王通当时之特征，决非后人所能伪撰。既有其书，则决有其人。其人虽不能详考，其书虽不能详定，大体而论，犹多可信。兹分述之如次。

先述王通其人。《全唐文》一三一《王绩与陈叔达重借隋纪书》有曰：

仆亡兄芮城，尝典著局。大业之末，欲撰《隋书》，俄逢丧乱，未及终毕。

《全唐文》一三三《陈叔达答王绩书》有云：

不知贤兄芮城有《隋书》之作。

又云：



贤兄文中子,知其若此也。恐后之笔削陷于繁碎,宏纲正典,暗而不宣。乃兴《元经》,以定真统。盖获麟之事,夫何足以知之。叔达亡国之余,幸赖前烈,有隋之末,滥尸贵郡,因沾善诱,颇议大方。

又云:

薛记室及贤兄芮城,常悲魏周之史,各著春秋,近更研览,真良史焉。

此证王绩有兄王通,并为《元经》之书也。

又《全唐文》一三一《王绩答程道士书》云:

昔者吾家三兄命世特起,先宅一德,续明六经。吾尝好其遗文,以为匡扶之要略尽矣。然峰阳之桐,以俟伯牙。乌号之子,必资由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吾自揆审矣,必不能自致台辅,恭宣大道。

是通于《元经》外,又有其他续经之作也。

又《全唐文》一三三《薛收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有云:

天下闻其风采。先君内史,屈父党之尊。杨公仆射,忘大臣之贵。收学不至谷,行无异能,奉高迹于绝尘,期深契于终古。义极师友,恩尊亲故。

是通之交际中又确有薛收其人也。

又《王绩答冯子华处士书》有云:

吾往见薛收《白牛溪赋》，邈乎扬班之俦。高人姚义尝语吾，薛生此文，不可多得。又知房李诸贤，肆力廊庙。吾家魏学士，亦申其才。所恨姚义不存，薛生已歿。使云罗天网有所不该，以为叹恨耳。

是薛收又确乎曾至通之家乡白牛溪也。贞观四年三月，杜如晦卒，八月，以李靖为右仆射。八年七月，右仆射靖逊位。此文云房李诸贤致力廊庙，正在贞观四年至八年间。书中仅致恨于姚薛之早歿，未见朝廷大臣，皆出文中子门下，亦未见姚薛之皆为文中子高第弟子也。

凡上引数文，虽甚简略，亦可窥王通之生平志业，与其师友风声之大概。乃王福畴录《东皋子答陈尚书书》（以下引福畴诸文皆见《中说》附录），略谓贞观初，仲父太原府君为监察御史，弹侯君集，事连长孙太尉，由是获罪。时杜淹为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于是太尉与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不用，季父与陈尚书叔达相善，陈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与陈公编之。陈公亦避太尉之权，藏而未出。重重作书遗季父，深言勤恳。季父答书，亡兄昔与诸公游，其言皇王之道至矣。仆与仲兄侍侧，颇闻大义。又《王氏家书杂录》，谓贞观初，君子道亨，我先君门人，布在廊庙，将播厥师训，施于王道，遂求其书于仲父。仲父以编未就，不之出。故六经之义，代莫得闻。窃谓其说颇可疑。长孙无忌为太尉，在贞观二十三年，太宗已崩。杜淹卒于贞观二年，若福畴追记，故曰长孙太尉，然王氏兄弟抑不用，其事应距杜淹之卒前后不久。又陈叔达藏《文中子世家》不敢出，岂有所谓先君门人布在廊庙，来求遗书之事。两相抵牾，一实必一虚。又福畴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魏公曰，大业之际，征

尝与诸贤侍文中子云云,此当在贞观四年杜如晦卒后,王氏兄弟既抑,魏征何复特称于通。较之王绩深惜姚薛不存,则福畴此文之伪,确然可知。

又福畴《王氏家书杂录》云:《中说》一百余纸,大底杂记,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则蠹绝磨灭,未能詮次。正(贞)观十九年,仲父起为洛州录事,以《中说》授余,余再拜曰:务约至深,言寡理大,其比方《论语》之记乎。因而辨类分宗,编为十编,勒成十卷。则《中说》一书之成编,乃出福畴之手,福畴亦自明言之矣。

又《全唐文》一八〇《王勃续书序》有曰:

先君文中子,《续诗》为三百六十篇,《续书》为百二十篇。当时门人百千数,董薛之徒各受其义。遭代丧乱,未行于时,历年永久,稍见残缺。贞观中,太原府君考诸六经之目,则亡其小序,其有录而无篇者又十六焉。家君钦若丕烈,图终休绪。乃例六经,次《礼》、《乐》,叙《中说》,明《易赞》,勃兄弟讲闻伏渐之日久矣,间者承命为百二十篇作序,而兼当补修其阙,始自总章,洎乎咸亨五年,刊写文就,完成百二十篇。

则《中说》一书出福畴編集,其子勃又明言之。是其书之多伪窜,乃出福畴,宜无足怪。

又《全唐文》一九一《杨炯王勃集序》有曰:

祖父通,隋秀才高弟。大业末,讲艺于龙门。其卒也,门人谥之曰文中子。

又曰:

文中子之居龙门也。睹隋室之将衰,知吾道之未行。

裁成大典，以赞孔门。讨论汉魏，迄于晋代，删其诏命，为百篇以续《书》。甄正乐府，取其雅奥，为《三百篇》以续诗。又自晋太始元年，至隋开皇九年平陈之岁，褒贬行事，述《元经》以法《春秋》。门人薛收窃慕，同为《元经》之传，未就而歿。君续薛氏之遗传，制《诗》、《书》之众序，《诗》、《书》之序并冠于篇，《元经》之传，未终其业。

据陈叔达所云，及薛收之自谓，收非通之传业门人。各著春秋，亦非为《元经》作传。此皆勃承其父为妄说也。然《续书》、《续诗》与《元经》之各有其书，则信而有征矣。

又《全唐文》六〇九《刘禹锡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王公神道碑》有曰：

王仲淹能明王道，隐居白牛溪。游其门，皆天下隽杰。著书行于世。

又曰：

始文中先生有重名于隋末，其弟绩亦以有道显于国初。

又曰：

文中绍扬微言，当时伟人，咸出其门。

殆其时福畴所叙《中说》已行世。禹锡见之，不深考，遂为所误。通之弟及其子孙，皆盛称通之《元经》、《续书》、《续诗》及《易赞》，偶及其《中说》，一因《玄经》诸书续经当重，《中说》模仿《论语》当

轻。二因诸书卷帙巨,《中说》卷帙小。然卷帙小者易传,卷帙巨者易失。又世运既变,观念趋新,南统日盛,北统日衰,即使《玄经》复存,中唐以后人见之亦增反感,不之重矣。今知《玄经》非伪,则《中说》亦非伪,特多福时之妄窜耳。

宋濂《诸子辨》引皮日休著《文中子碑》,谓通生陈隋之世,以乱世不仕,退于汾晋,序述六经,敷为《中说》,以行教于门人。因谓皮唐人,距隋为近,其言若此,可证通之必有其人矣。

今再读《中说》,知王通亦出北方大门第。其先祖虬自宋北迁,仕于魏。见《文中子世家》。《中说》中引述其祖先北迁后六代之著作,有《时变论》、《五经决录》、《政大论》、《政小论》、《皇极谏议》、《兴衰要论》等。以儒学传统而不忘当世政教大纲盛衰要端,乃确乎北方门第之学统。通之自为《礼论》、《乐论》、《续书》、《续诗》、《元经》、《赞易》,皆承其门风也。惟既注重历史观点与传统文化,通乃以政教为先而种姓次之,公然承认北方为正统。其述北魏皇始而叹曰:戎狄之德,黎民怀之。又曰:乱离斯瘼,吾谁适归。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故《元经》帝元魏。其于苻秦王猛及魏孝文皆颇推誉。有曰:苻秦举大号而中原静,惟王猛知之。又曰:中国之道不坠,孝文之力也。中国士民东西南北,自远而至,猛之力也。《元经》其正名乎。皇始之帝,征天以授之也。晋宋之王,近于正体,于是乎未忘中国。齐梁陈之德,斥之于四夷也。以明中国之有代,太和之力也。又曰:太和之政近雅。江东,中国之旧也。衣冠礼乐之所就也。永嘉之后,江东贵焉,而卒不贵,无人也。又曰:其未亡,则君子夺其国焉。曰:中国之礼乐安在?其已亡,则君子与其国焉。曰:犹我中国之遗也。是通在种姓观念上,固同情南朝,而在政教文化观念上,则转向北朝。故曰:《春秋》,一国之书也。《元经》,天下之书也,以其无定国而帝位不明。又曰:《春秋》抗王而尊鲁,《元经》抗帝而

尊中国。又曰：尊中国而正皇始。又曰：《元经》兴而帝制亡。盖以种姓而尊中国，亦仅能尊其文化，不复能尊其王统，此《元经》之志也。即此一点，亦可证《中说》之书，决非唐室已统一后人所伪造。其书之原本，则尚成于隋初也。

据《中说》所附《文中子世家》，通生于隋开皇之四年。开皇九年，江东平，通十岁。此有小误。又曰：仁寿三年，文中子冠。西游长安，奏《治平十二策》。《中说》：仁寿大业之际，其事忍容言耶？又曰：子在蒲，闻辽东之败。又曰：江都有变。子有疾，谓薛收曰：道废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后礼乐可称也。《世家》又云：江都难作，子有疾，寝疾七日而终。是通卒当在唐武德之三年，其寿四十左右耳。而著述斐然，诚一代之才人矣。

同时稍前，有北齐颜之推之《家训》，可与《中说》之书略相比较。之推生世先于通，其家北迁则后于王家。之推乃南士翘楚，沦陷北朝，看不惯当时北方一种胡汉混合之局面。乃曰：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此乃凭于门第教育以求保存完整种族传统文化之深心，此乃南方人观念，然亦只限于一门一族之内，为教子教孙之语。至于《中说》，则着眼到全国全群之治乱兴衰，上下古今政教文化之大关节，大脉络。而治统非所重，此乃北方人观念。当时南北双方，同有门第，而由于处境不同，观念相异。故南方较盛小家庭制，而宗族观念转重。北方较盛大家庭制，而种姓观念转轻。此即颜王两书，亦可以觐当时南北学术风尚之大体矣。故王肃不如李安世，王肃只练习掌故仪文，而李安世则能创建制度，福国利民。徐陵、庾信亦不如苏绰、卢辩，徐、庾只求文章绮丽，苏、卢则务经术通明，期一世于治平。《中说》显属北方学统，

乃递禅积累之久,而有此境,固非其或前或后人之所能伪造也。

今再就佛法信仰言之。颜书极信仰佛法,有曰:求道者身计,惜费者国谋,不可两遂。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隐有让王辞相,避世山林。安可计其职役,以为罪人。此乃解释僧尼减耗课役为损国而发。当时南方士大夫,在汉族治统下,个人主义转形浓重,而国家观念转滋淡薄。北方门第则处异族政权统治下,转重社会大群胜于私人。因此南方士人之皈依佛法,若全属私人事,即梁武帝信佛,亦全出私人,若忘其身之为帝王之尊,负国家之重任者。而北方两次法难,则全从国家大群政教理论上出发。儒释对立,乃争世道。私人信仰则并不重视。而王通之对佛法,则又别有见地。

《中说》有云:

《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此谓信仰者与所信仰者当分别而论。如梁武信佛,岂得谓梁武所行即佛道乎。其说极深允。《中说》又曰:

或问佛,曰:圣人也。曰:其教如何?曰: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

信西方之教以行之于中国则泥,此仍本大群政教立论。至于佛法当否,以及私人信仰,在此可有所不问。《中说》又曰:

程元曰:三教如何?子曰:政恶多门久矣。曰:废之如

何？子曰：非尔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尔。子读《洪范谗议》曰：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征进曰：何谓也？曰：使民不倦。

此仍专重治道政术，非斤斤于私人信仰之异同。若为政而同尊三教，是政出多门也。若奉其一而废其一，而强民之从，则抑之正所以张之，纵风推波，亦非治术所宜取。惟求建皇极，使民群趋之而不倦，则三教可一，此犹欧阳修之有本论，在上政治得道，则在下之宗教信仰自可消减，此则王通之意。《中说》又曰：史谈善谈九流，知其不可废，而知其各有弊也。又曰：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故曰存乎其人。斯诚可谓圆机之识矣。若唐代为治者有此识，则不复有韩愈之崛起矣。

故王通《中说》，乃粹然儒者言，与颜之推之归心佛法自不同，而其对崔浩、苏绰亦致不满。《中说》有曰：

崔浩，迫人也。执小道，乱大经。

又曰：

苏绰，俊人也。行于战国，可以强。行于太平，则乱。

其所上下于崔浩、苏绰两人者，亦一本治道政术言，非就于崔浩、苏绰两人之一信佛，一不信，而分上下也。苏绰有《佛性论》行世，其人亦信佛，而能为北周创制立法，厥后隋唐规模多基于此。然周武之法难，亦不可谓非绰有以启之。绰之肇后祸，故曰：行于太平则乱也。故王通之意，乃以苏绰为拨乱世之人物，而自居则欲为升平太平世人物，固不仅世运变，而学者之意想亦随之

变,通之识趣,较之苏绰,亦可谓更臻于明通矣。

综合上述,可知通之儒业,乃承两汉之风,通经致用,以关心于政道治术者为主。至如心性修养日常人生取与释老争短长者,在通书中,殆少厝意。故其论儒业,亦特以史为主。其言曰:

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

此谓儒学即史学,而可三分之。一政事,有关制度者。一文学,有关民情者。一节行,有关人事者。《书》、《诗》、《春秋》各当其一。通之《续书》、《续诗》与《元经》,即继此而作也。

通又极推周公,其言曰:

有周公而经制大备,有仲尼而述作大明。千载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见而见也。有绍宣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

是通之为学,虽重政道治术,以不得位,不能效周公之兴礼乐,立制度,遂效孔子之述作。而曰:

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见也,舍两汉将安之乎!

是通在政道治术上,亦不高慕唐虞三代,而惟寄情于两汉。通有《治平十二策》,然其告人曰:

时异事变,不足习也。

又曰：

非君子不可与语变。

可见通之言治道，非泥古为高论，而乃深通于时变者。《中说》又云：

子在长安，与杨素、苏夔、李德林言，归而有忧色。门人问，子曰：素与吾言终日，言政而不及化；夔与吾言终日，言声而不及雅；德林与吾言终日，言文而不及理。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无礼也；言声而不及雅，是天下无乐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何从而兴乎？是吾所以忧也。

通固与杨素、苏夔、李德林言之乎，此可不论。要之通之言，乃其学养之所至，志业之所寄矣，非如其子福畴之徒之所能伪为也。惜乎，兴唐之运，通已不及见。通所理想之礼乐文章，唐初诸人，似亦少能理会。而《中说》诚不失为一醇儒之书，确然乃南北朝末运一大著作，洵是北方儒统仅有之结晶。洎乎唐初，其道竟已消沉，亦少影响可见。盖南统已胜于北统，是诚大可惜之事矣。

《中说》后有《附录》一篇，乃福畴所为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大意记太宗贞观时，曾屡语房杜诸臣，欲兴礼乐，讲太平。房杜谦逊，群推魏征，进说周道。太宗因之读《周礼》，欲行封建井田。诸臣会议数日，卒不能定。太宗敦促，因对群臣无素业，何愧如之。徐思其宜，教化之行，何虑晚也。太宗曰：时难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卿等退，无有后言。征与房杜皆惭栗再拜而出。因相叹曰：若文中子门人董常、薛收在，适不至此。此自系

福峙或王勃辈所文饰,然太宗欲行封建,而长孙无忌诸臣谢不敢当,明载于唐史,无可疑者。《周礼》一书,乃北朝学者所重。北周如苏绰、卢辩,北齐如熊安生,即王通《中说》,亦盛推之。然通明言,二帝三王不得见,舍两汉将安之。而唐太宗浮慕三代,欲本《周礼》复行封建,事可有之,惜其距通之所见,则大有间矣。昔秦廷博士儒生,创议复封建,始皇帝拒其请,乃至下令焚书。今唐太宗为群臣谋,欲加封建之赏,而群臣辞谢不敢承,此乃中国历史上所当大书特书之一项盛德嘉话也,而秦始皇时君拒臣请,唐太宗时臣拒君请,一正一反,后先辉映。就通之言历史时变其中有曲折大义可资发挥。而惜乎如通之识,已不复有,然通若至唐初尚在,亦必不赞同太宗之议复封建可知。而房、杜、王、魏诸公,于当时创制垂统之积极方面,实无大贡献。租庸调制本之北魏,府兵制本之北周,进士科举制本之隋,其他殆并无大建立。苟论百代规模,一王大法,则以兴唐上较秦皇汉武,皆有愧色。为大群全体政教本原创制立法,开召太平,此本儒家大理想,大抱负,而自东汉以下,小己私人主义,门第家世传袭,老庄玄学,佛释出世,群凑当路,儒业已成一伏流。沦泯之余,幸在北方渐有复苏。经苻秦北魏周隋数百年间,络续有进展,通之《中说》,即其一仅存之硕果也。然而培育未成熟,生长不充实。遽逢天日清夷,太宗虽好名浮慕,不失为可与为善一英主,而房、杜、王、魏诸贤,却于政教大本原处少所开陈。北方儒统所仅仅凝聚的一些珠光宝气,却为统一盛运之大潮流所冲淡。文章则转尚齐梁轻薄艳丽,经术则仅止于刘炫、孔颖达之类,亦已为王通所贬斥。若论节行,经不起盛世之热流薰蒸,不到一两传,气骨俱靡。通所言之三史,即《书》、《诗》、《春秋》三经之精义,俱不能有所树立。王通若遇兴唐,果否能有所建白,事未可定。但其所抱负之理想,则显然不为时贤所重。故其人其书,在初盛唐